

顾问：郑杭生 李亦园 乔健 容观璜

主编：徐杰舜 吕志辉

人类学高级论坛

SENIORANTHROPOLOGYFORUM

YOU MU WEN HUA YU NONG GENG WEN HUA

游牧文化 与 农耕文化

人类学高级论坛 2009 卷

齐木德道尔吉 徐杰舜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游牧文化与 农耕文化

人类学高级论坛 2009 卷

齐木德道尔吉	徐杰舜	主 编
那顺巴依尔	阿拉坦宝力格	副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齐木德道尔吉,徐杰舜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3

ISBN 978-7-207-08615-0

I. ①游… II. ①齐… ②徐… III. ①游牧—民族文化—研究—中国②农业—传统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K28②F3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4877 号

责任编辑:朱佳新

封面设计:李梅

版式设计:徐杰舜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

YoumuWenhua Yu Nonggeng Wenhua

齐木德道尔吉 徐杰舜 主编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E-mail hljrmchs@yeah. net

印 刷 哈尔滨金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

字 数 48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8615-0/S·122

定 价 36.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人类学高级论坛/总序

人类学研究本质上是理论研究,要解决的是人类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问题。人类学本土化的意义,就在于怎么把产生于西方的人类学这门学问引进中国,拿来解决我们中国自己的本土问题,甚至包括理论的本土化、对象的本土化、话语的本土化,还包括手段和队伍的本土化。人类已经跨入充满挑战与机遇的 21 世纪,回顾人类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后,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经过中国人类学家的不懈努力,中国人类学从无到有,从依附到向独立发展,从引进到形成具有某些特点的中国学术倾向,并着力从事中国人类学体系的建立。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其精神实质是博大的世界目光,是科学的论证方法。因此,人类学要求人类学家跳出狭隘地域限制,以一种俯仰天地,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宏观视野来审视其研究对象。所以对国内外研究的经验,我们要认真学习,但反对全盘照抄。纯粹的“拿来主义”是要不得的,只有将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中国人人类学研究实践相结合,在学习国内外研究经验的同时,发挥个人研究专长,在研究中强调综合取向,跳出西方学术界固有的窠臼,发扬中国文化兼容并蓄的传统进行研究。为此,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宗旨是:

1. 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

中国历史的悠久是举世公认的,其相关历史文献的丰富也是举世无双的。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是人类学一座古老而丰富的学术宝库。但是,几千年来,虽然出现过以《史记》作者司马迁为代表的历史学派,

他开创了纪传体的研究方法,在《史记》中对当时的中国的民族作了我们今天所称的民族志描述,但其后,尤其是清代考据学派的兴盛,他们运用训诂、校勘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研究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使得近现代的学者往往只重史料的考证,却忽视对经过考证的材料的理论升华。今天我们面对新世纪,在推进人类学本土化的时候,提倡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重新审视、重新整合,作出新的解读和分析,从中概括出新的论题,升华出新的理论,使人类学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受一次洗礼。

2. 对中国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一向是人类学家们看重的研究方法,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今天,由于人类学本土化的需要,田野调查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因此,人类学必须走向人民、走向社会,而不应该走进书斋、走进象牙塔。而走向人民、走向社会就是走进田野进行调查。当前在占有世界上五分之一强人口的中国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巨大的一次社会变革,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的迅速转型为人类学提供了最大最丰富的田野研究园地。中国人类学家应该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对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的空前的社会经济文化大变迁展开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写出不愧于这个时代的研究成果。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类学理论在具体的田野调查中受到一次洗礼,从而使人类学的理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甚至从中升华出新的理论来。

3. 把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与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

西方人类学界有许多流派,其共同特点是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中国学者的特点是擅长历史文献的考据。而人类学的研究则既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们从考据中跳出来,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又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家要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换句话说就是要求中国的人类学把对中国历史文献的人类学解读与对中国现实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中国的人类学才具有生命力,才能产生具有国际

影响的人类学大师,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人类学学派。

本着这样的宗旨,由中国海峡两岸四地(大陆及台港澳)20家有影响的人类学研究机构和机关单位发起设立的人类学高级论坛,每年或隔年举行一次。每次论坛的演讲、发言和论文结集后由决心推动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们坚信,在“人类学高级论坛”这个舞台上,将演出一幕又一幕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大戏”。

徐杰舜

2002年7月20日

于广西民族学院相思湖畔

目 录

总 序

- 001 徐杰舜 人类学高级论坛/总序

论坛绿皮书

- 003 彭兆荣 李春霞 游牧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述评

论 坛 文 件

- 037 陈国庆 第八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开幕式上的欢迎词
039 胡春惠 第八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开幕式上的开幕词

主 题 演 讲

- 043 徐新建 牧耕交映:从文明的视野看夷夏
063 关 凯 让民族成为政治工具:反思清帝国的跨文明统治
076 艾埏雅 漠北游牧与西域农耕
——维吾尔文化嬗变之窥
106 邓启耀 从马背到牛背
——云南蒙古族民间叙事中的文化变迁镜像
130 徐杰舜 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亲和论

- 144 罗彩娟 成吉思汗与依智高的比较研究
——基于蒙古、壮两个民族性格特征的分析
- 160 黄仁德 吴铭家 中国草原退化的成因与治理
- 170 阿拉坦宝力格 从游牧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时候
——演变中的“牧区大寨”神话故事

论坛纪实

- 199 全体参会代表 海峡两岸圆桌会议纪实

理论论坛

- 237 吴秋林 郎丽娜 文明形式论
- 251 钟进文 口传与文本哪个更有穿透力
——关于农业与游牧文明的思考
- 257 林敏霞 有关当前“草原文化”相关表述的思考
——兼论民族国家与全球化时代的草原文化
- 267 孙亚楠 边缘的抉择与占有的本性
——两本书对于“边缘”和“中心”的思考
- 281 冯雪红 超越边缘
——评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历史论坛

- 289 王明珂 游牧社会及其历史的启示
- 295 赵旭东 侈糜、奢华与支配
——围绕13世纪蒙古游牧帝国服饰偏好的读书笔记
- 325 阿拉腾嘎日嘎 关于嫩江流域牧业的地域性
——以20世纪初扎赉特旗为例
- 339 马丹丹 他者何方：长城与寨墙
- 362 孟 华 农耕文化的物证系列之一：“猪”和“地瓜”

373 特古斯巴雅尔 多尔吉梅林撰《牧人咨询》及其本土知识研究价值

383 杨春艳 祖灵筒

——在农耕文明中凝固的草原灵魂

390 黄明同 从《实业计划》看孙中山对草原建设的关注及启示

397 乌仁其其格 近代土默川地区民族关系研究

——以蒙汉民族关系为例

409 那顺巴依尔 内蒙古现代化先驱者视野中的游牧社会:主体性的他者化

——以喀喇沁右翼旗贡桑诺尔布为例

现状论坛

421 罗树杰 文化侵蚀与内蒙古草原生态的恶化

——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视角看内蒙古草原生态问题

431 郭崇荣 民间信仰、习惯法与生态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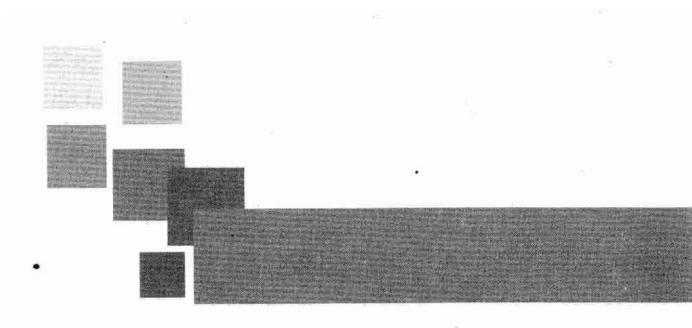
——试析青海藏族生态观念对保护草原环境的影响

444 周全德 中原农耕文明的人伦日用效应

454 张 雯 内蒙古的草原生态与社会变迁

——既有的研究发现

465 李世源 宝镜湾岩画:灵魂出窍



论坛绿皮书

游牧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述评

彭兆荣(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李春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国外游牧人类学研究概况

世界上的游牧民正在骤减为濒危少数民族群。游牧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已经小于 1%,而且正在受到更多的压力而放弃他们的生活方式。^①在此,我们选择几部相关研究的代表作进行介绍和评述,以管窥国外游牧社会的人类学研究。

游牧社会的定义并不统一,作为一种社会类型,游牧社会可被看做依赖于家畜与空间移动或游牧的协调共存。(Dyson-Hudson, 1980) 当今的游牧可被看做移居者对于带有族性(ethnicity)相异的社区或国家的多样适应性反应。(Bates, 1973: 226; Khazanov, 1984: 6, 199) “纯游牧”(pure nomadism) 理论认为,独立的移居民与外部市场是游牧民的理论前提。(Dyson-Hudson, 1972: 8) 这种假设忽略了游牧与定居社会之间的内部关系(Bates 1972: 48),有一些游牧民,如吉卜赛人,并无自足独立的经济市场,然而这并不否定其为游牧民的特质,而对其社会形态尤其是社会关系的研究,理应成为游牧民研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吉卜赛人的经济更多的存在于更为广阔的经济体系之内,在与其他族群的交往中获得生存。与放牧型游牧民不同,吉卜赛人的动物马匹只具有交通工具的意义,而不是食物的来源。与其他主要游牧类型相比,吉卜赛人能作为“都市游牧民”生存并繁衍,而不依赖于狩猎、采

^① Ken Teague, *Nomads: Nomadic Material Culture in the Asian Collections of the Horniman Museum*. The Horniman Museum and Gardens, London; The Museu Antropológico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2000, p13.

集和放牧。他们的生存与繁荣更多的与都市经济和人口体系相挂钩。^① 根据历史进化理论,一些研究者往往把游牧民作为“野蛮人”来分类(Erturk 1999:2—4;Sinor 1990:18),但是中亚与西亚的历史则告诉我们,游牧民的文化曾长久的影响着当地的文化甚至占相当长的文化主导地位。从物质文化上来讲,游牧民只能被看做是“局部型社会”(part-society),因为他们的生活与定居社会紧密相连,互相影响和依赖,所以有时很难区分。^②

游牧社会有着长期的发展历史和多种样式的社会形态,不能仅作为单一的社会类型来看待。从类型学角度来讲,游牧民(nomads)一般分为两大类:狩猎采集型(hunters and gatherers),草原游牧型(pastoralists)。按照 Thomas J. Barfield 的《游牧抉择》(The Nomadic Alternative)(1993)^③一书的介绍,现今世界上存在着五个主要游牧地带:1. 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2. 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3. 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4. 从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5. 西藏高原及其邻近山区高原。另外还有两个可以视为典型游牧社会变体的特殊地区:1. 欧亚北部高纬地区。以苔藓为食的驯鹿是牧民的饲养和狩猎对象,同时也是运输工具。2. 南美安第斯高地。饲养羊驼(美洲骆驼),牧民的经济传统是高山农耕与牧场相结合。这种研究在类型学上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参照。

游牧研究的历史

(Anatoly M. Khazanov: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1983)

早在游牧社会形成之前,西亚的古老国家就已经开始处理放牧者或者是半游牧者的问题了。最早期的描述多数是游牧人群相对于定居人群的差异性和奇特性。从公元前 1000 年左右开始,之前的放牧者和半游牧者在西亚地区开始转变为真正的游牧者,当地人的敌意、战争与

① Judith Okely, *The traveller-gyps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52 ~ 53.

② Ken Teague, *Nomads; Nomadic Material Culture in the Asian Collections of the Horniman Museum*. The Horniman Museum and Gardens, London; The Museu Antropológico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2000, p16.

③ Barfield, Thomas J., *The Nomadic Alternativ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93.

争夺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现象,圣经预言描述了当时的情境。在圣经与亚述—巴比伦的资料中,关于当时的游牧者的政治故事都有记载。但这些都还不具有民族志式的研究意义。

根据苏联学者哈扎诺夫(Khazanov)的划分,截至20世纪80年代初,游牧社会的研究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游牧社会的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包括古代、中世纪继承和延续古代传统的部分时期。在这个时期游牧者成为持续的社会现象,尽管这种现象经常是以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形式出现的。定居性社会的政府与军队官员与游牧者的交涉并不影响学术研究,学者们的生活多数都是远离游牧者,只有少数例外,他们通常是描述与农业社会或城镇居民迥异的游牧者的生活方式、道德习俗。这些描述记载了游牧者不事农业、随家畜逐水草而迁徙,没有固定的迁徙模式。这些记载通常以口传的方式,在古希腊语、古罗马语、古汉语,甚至是一些中世纪资料中反复相传,他们相互之间也存在逐字承袭互译的现象。

游牧社会的第二个研究阶段,始于中世纪,延伸至部分现代阶段。一方面,这一阶段继续、传袭之前的做法,延伸并丰富那些记载和描述;另一方面,游牧研究出现了一些新方法和新内容。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Rashid al-Din 和 Ibn Khaldun,作为政治家,他们认识到游牧民是政治生活的常题,但他们同时也是学者;在他们的作品中,游牧生活与特定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第一次获得了严肃的学术考量。他们对于游牧者的社会组织也做了更为进步的研究。Rashid al-Din 是第一批对游牧者的亲属关系与宗族谱系进行关注的学者之一。这两位学者的作品与同时代其他人的作品一起,使得游牧者不再作为文明的副产品或对立物、历史的流产儿出现,而是完整的、连续的,甚至充满活力的历史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游牧者,Ibn Khaldun 构想的文明周期循环观念将不能成立。

游牧社会的第三个研究阶段是与现代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建立相关联的。在西欧,游牧入侵的恐怖事件已经逐渐成为历史,因此,游牧社会的研究与东方学者相比已经不再那么经验主义。他们开始尝试新的方式,从进化与历史的角度,重新界定游牧民与畜牧民的术语含义。

18、19 世纪,三分论(tripartite theory)十分流行,但是它也带来了 Ibn Khaldun 曾经面对过的难题。许多学者试图不仅要界定,而且要评估游牧者在人类发展史和国家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这个时期,Mon-

tesquieu 与许多其他学者试图建构游牧社会平等的主要特征, Fergusson 和亚当·斯密则认为畜牧文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差别。康德认为国家就起源于游牧者与农耕者的斗争之中。黑格尔则认为, 尽管斗争是其主要特征, 但游牧者应与国家出现之前的第二前历史阶段相关联。

到了 19 世纪早期, 一个特定的趋势, 或者说一种游牧理论研究的惰性特征形成了。游牧民 (nomads) 与畜牧民 (pastoralists) (区分并不鲜明) 不再被看做是特定的民族志现象, 而是人类总体发展史的一个因子。游牧民的特征不是由定居民、而且由文明开化的城镇居民来界定。

当然, 在这个时期, 尤其是在 19 世纪, 与这种历史进化论关系甚微的另一种游牧研究观念迅速形成。与这些足不出户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不同, 田野研究者开始在非洲、近东、中东、欧亚大陆大草原、亚洲腹地进行实地研究。这些研究者还不是专业的人类学者, 而往往是单纯由于实际需要而移居去当地做研究, 但是, 他们的研究无疑成为特定游牧民的第一手描述性资料。这些描述往往不是很有技巧, 更谈不上专业, 但是他们为之后的重新研究提供了大量必须的原始性材料。

游牧研究的第四个阶段, 可以界定为 20 世纪的前半个世纪。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 一方面, 游牧研究开始变得非常具有人类学的特性; 另一方面, 人类学的理论发展与游牧社会研究实践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落差, 尽管这一时期的田野研究已经由专业人类学者开始执行。这在 N. Dyson-Hudson (1972) 的文章中有详细说明。(译下)

这个时期, 有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出现, 例如, 地区、社会—文化与环境适应理论, 功能—结构论, 跨文化理论, 心理学理论, 新进化论与生态学研究, 等等。它们花样繁多, 应用广泛, 但是却很少涉及游牧民研究的数据, 也没有对游牧社会研究产生很大影响。有一些理论, 如文化圈 (Kulturkreislehre) 模式、征服理论 (conquest theory) 虽然对游牧社会有一些兴趣, 却是停留在先前理论的操作和实践上。

历史学与人类学在游牧社会研究上的分歧也变得更为明显。除了汤因比 (Toynbee), 历史学学者与学派继续认为, 对于人类进化与历史的观念, 游牧民研究并无立足之处; 与此同时, 在人类学界开始流行的同时性研究, 则极少涉及历史性材料。这个时期, 唯有 Lattimore 的作品《中国亚洲腹地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 of China) (1940) 最为突出。

游牧研究的第五个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始于西欧,苏联的研究也成为同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人类学田野研究开始明显扩张到游牧社会,进行游牧民及游牧生活相关问题研究的学者数量大大增长。关于游牧民的材料开始得到采用和详细审察。苏联的后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在学术界得到体现,学者们开始更多的关注游牧社会与定居社会的差异,他们的社会政治组织及其运作和发展的特殊形式。著名的苏联游牧理论人类学者 Khazanov 认为,由于积累了大量研究资料,游牧社会的研究应该开始从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转变,应该关注游牧社会的内外系统、结构、功能及纽带的整合式研究,不仅仅把游牧社会看做是地方的、特殊的或者多线进化的一种孤立形式,而且也应看作做是人类历史的基本的整合性因子。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游牧社会与现代经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冲突,游牧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很多重要的分支性课题。Willy Kraus(1969)认为,对于游牧社会有两种对立的极端性观点,一种认为游牧经济作为前工业经济形态,已经脱离于现代发展政策的轨道之外,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还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但是作为社会实践则不具存在的价值,因此,作为政策议题,游牧者越来越倾向于被定居化、农业化或者畜牧饲养化。另一种观点认为,游牧技术为荒凉不垦之地提供了生产力的可能性,对于提供动物产品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将游牧者纳入定居者系统是不明智的。在这两种极端论点之间,学者们开始探讨更为细致的问题,生态学、权力与统治、种族进化、认知与价值体系^①等研究课题成为流行的研究主题。当然,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也成为研究的必然趋势。例如,游牧的生态学研究自然的与政治的、社会的研究角度结合起来,这在人类地理学学者 F. Ratzel 的观点里早就成为事实。

随着21世纪的到来和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游牧社会也受到更为强烈的挤压,游牧研究与此同时也变得更为细致。游牧者的形态和人们对于游牧者的态度出现了很大转变,几个世纪以来,定居者对于游牧者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是恐惧,把他们看做是盗贼、劫匪,

^①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 1973: Chicago, The nomadic alternative: modes and models of interaction in the African-Asian deserts and steppes. Mouton; Chicago: The Hague. Distributed in the USA and Canada by Aldine, 1978.

要求政府控制、压制他们,解除他们的武装,使其定居下来等等,现代社会中的游牧民也包括旅行者、无家可归者,持续着社会对他们的恐惧和紧张;另一方面,游牧者被看做是“高贵的野蛮人”,人们对其生活充满了浪漫的想象,将其写入小说、编入电影,很多现代民族甚至将其视为自由与独立的象征。从20世纪开始,游牧者就被迫定居下来,成为种植者或工厂工人。在亚洲尤其是中亚,在斯大林定居化、集体化政策的强制下,与大规模的垦殖者移民的共同作用下,游牧者及畜群受到了灾难性的影响。现在,游牧者的生活受到越来越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威胁,包括干旱、政治高压、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而现代旅游也使游牧社会更多的接触到外来者,这都加速了游牧者社会和文化的剧变。因此,现在的游牧研究,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的社会变迁、文化记录,人们对于少数民族包括游牧者的关注也日益增长。现在游牧研究观念集中于人权问题、游牧社会正当享受其传统生活方式等问题。UNESCO、一些非政府组织、人权组织正在为保护这些生活方式的传承而努力。另外,关于游牧社会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研究和保护、游牧社会的教育与医疗问题,也成为被高度关注的研究对象。

游牧社会的人类学研究

(Neville Dyson-Hudson)

1969年召开的美国人类学学会年会上,“游牧社会研讨会”成为游牧社会研究的重要事件。此次会议的论文被编入1972年编订的“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国际研究”论文集第八卷,美国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Neville Dyson-Hudson教授的文章《游牧研究》,对于人类学界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做了十分详尽而重要的总结。

尽管游牧研究已经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作品也相当广泛,涉及多种语言,但是“游牧研究似乎一直停留在创始阶段,而并未见其增长。”(p2)

尽管兴趣繁多,19世纪的游牧研究却只建立了非常薄弱的人类学游牧研究基础。此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Robertson-Smith,对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研究,成为较有广泛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他的主要作品有,《早期阿拉伯的亲属关系与婚姻》(1885),沿用了人类学界的“裂变宗族制”理论来解释游牧社会的主要社会关系性质,但是与此同时他提及的游牧社会的“契约”性质,现在仍旧被认为是游牧政治的显著特征。在《闪米特人的信仰》(1889)中,提出了“牧民信仰”(pastoral